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下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下 册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张正明 张乃华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称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中,萌发最早的就是民族主义,成效较大的也是民族主义,史学界至今争议尚多的还是民族主义。

孙中山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①参与武昌首义和策动各省响应的革命党人,并不都当真赞成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然而无不服膺民族主义。当年的孙中山,立志“振兴中华”,^②以民族主义为天下倡,使中华民族增强了自求解放的勇气和信心。可以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首先要归功于孙中山的饱含着民主革命精义的民族主义。

史学界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还有若干歧见尚待继续推敲,还有若干问题尚待深入探讨。因此,尽管在五十年代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就有两篇文章的题目叫《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③今天我们还是乐意用同样的题目来申述自己的浅见。

①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引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页615。

② 《兴中会宣言》,《孙中山选集》页19。

③ 李光灿:《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见《新建设》1956年12月号;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见《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4期。

一、演进阶段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时俱进。他的民族主义纲领,起自“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迄于“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其始而察其终,变化之大是一望即知的。所以,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必须确切地划分出它的演进阶段来。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哪几个演进阶段呢?

较早的说法,以张克林为代表,是在三十年代提出来的,以下简称“张说”。张说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汉族的民族自决时期(兴中会至同盟会);(二)有名无实的五族共和时期(辛亥革命至中国国民党改组);(三)中国民族反帝斗争时期(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①张说有唱无和,方经提出,便成绝响。

在张说所指的第一个时期,孙中山发动革命排满,只是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创立共和政体,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奴役,不是为了使满汉二族各自立国,说不上什么汉族的民族自决。在张说所指的第二个时期,以为五族共和是孙中山的主张实属误断。本文第四节将要说明,五族共和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本意。所谓五族共和,无论它的名和实相副与否,都不能作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进的一个阶段。在张说所指的第三个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反帝固然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可是不能兼代对内方面。把这个时期称为反帝斗争时期是片面的。总之,我们认为张说是碍难接受的。

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进阶段的一个较晚的说法,是在四十年代由崔书琴提出来的,以下简称“崔说”。崔说也划分为三个时

^① 张克林:《孙中山与列宁》(南京拔提书店1934年版)页34——36。

期,但是界限和内容都和张说不同。崔说的三个时期是:(一)自孙中山决心倾覆清廷时起,至辛亥革命止,侧重在推翻满清统治;(二)自中华民国成立时起,至欧战终了止,是民族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孙中山认为以推翻满清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已经成功;(三)自欧战终了起,至演讲民族主义完了止,是民族主义的成熟时期,孙中山正式提出了反帝和民族自决的主张。^①崔说的命运和张说大异,属而和之者不乏其人。后来台湾学术界人士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大抵仍宗述崔说。七十年代,杨逢泰也一本崔说,无所改易。^②

崔说的弊病,在于既忽视了旧三民主义创立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显著变化,又忽视了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重大区别。关于上述显著变化和重大区别,我们将在下文适当的地方加以说明,这里就暂不细说了。

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演进阶段,应当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为分期的基本依据,以孙中山创建的革命政党更代的顺序为断限的参考标志,兼顾思想因素的萌发和思想体系的完成,采取宁细勿粗的方针,以求脉络分明。

我们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下列五个时期。

(一)兴中会成立之前,是酝酿时期。当时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出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纲领是他在1893年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商定的“驱除鞑虏,恢复华夏”。

(二)与兴中会同始终,是向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过渡的时期。当时孙中山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

① 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页1。

② 杨逢泰:《民族自决的理论和实际》(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页140——141。

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的藩篱。这时他的民族纲领，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包纳在兴中会的誓词中。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按：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誓词称“恢复中国”，1895年香港兴中会誓词改称“恢复中华”。）

（三）同盟会成立以后至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前，是旧三民主义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同盟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即革命排满阶段。孙中山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彻底民主的革命民族主义。这时他的民族纲领，包纳在同盟会的誓词中。同盟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按：这四句话，是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举办青山军事学校时初次提出来，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正式作为誓词定下来的。其第三句，始称“创立”，后改“建立”。）

2. 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即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确认民族平等和倡导民族同化的阶段。我们不把这个阶段划为过渡时期，是因为当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没有超出旧三民主义的范畴。

（四）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至国共合作实现之前，是向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时，孙中山改变了民族主义已经实现的旧看法，提出了民族主义只实现了一半的新看法。对外，他主张民族自决，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对内，他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少数民族。

（五）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是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形成的时期。这时孙中山对外，坚持反帝国主义；对内，主张实行民族的自决、自治和联合，不主张民族同化了。

从孙中山民族主义回旋上升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位伟

大的革命先行者毕生追求真理和皈依真理的精神。孙中山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认识是一次完成的。当形势的发展证明他先前的某个主张有所失当,他是勇于弃旧图新的,这大概可以说也是孙中山典范犹在的一个方面吧!

二、渊源和要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演进阶段上采择了出自不同渊源的思想。这些出自不同渊源的思想,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渊源,必须分清孙中山接触这些思想的先后和受影响的深浅。反之,如果象个别有关论著那样,平列而齐观,是无补于事的。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几种出自不同渊源的思想的机械的组合,而是由孙中山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融会贯通了这些思想之后创立的独具一格的民族主义。因此,在考察它的渊源的同时,要把分别构成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要素都清理出来,才可以把握住它的整个体系。

兴中会成立之前,孙中山的正在酝酿中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这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说远一点,是内中国而外四裔、贵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正统观念;说近一点,是明朝遗老和江南会党反清复明、扑满兴汉的思想。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萌发的社会基础,则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反封建主义斗争,以及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了争取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活动。

孙中山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①所谓“先民所遗留者”,就是传统的华夏民族意

^① 《中国之革命》,引自《孙中山文集》(甘乃光编,上海国民书局1926年版)页53。

识。至于“改良其缺点”，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进的第一个时期还看不出来。

有些研究过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同志说，所谓“先民所遗留者”主要是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我们认为，这个论点的论据是不够的。

诚然，孙中山在私塾读书时，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许，这是历来传为美谈的。不过，那时的孙中山还是一个少年，见事未广，阅世未深，甚至还“没有听见说北京是皇帝权力的中心”，^①说不上已具备了成型的民族意识。几年之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曾说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这也是论者常常援引的佳话，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孙中山是洪秀全的信徒。

有两个人，都被孙中山视为民族革命英雄，可以比较一下，一个是朱元璋，另一个是洪秀全。孙中山反对“以成败论豪杰”，反对“是朱非洪”，^②然而他确实认为朱元璋在“民族革命”方面的贡献比洪秀全在这方面的贡献大。他说，朱元璋“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③洪秀全则不幸没有做成民族革命。洪秀全关于奉天讨胡的说教，如“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胡妖人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④等等，和孙中山的思想是扞格不入的。与此相反，朱元璋的民族意识和孙中山当年的思想比较合拍。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分明就是朱元璋讨元檄文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翻版。朱元璋讨元檄文中还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⑤类似的话，孙中山也说过多次。兴中会成立前，孙

①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三民公司1927年版）页35。

② 《太平天国战史》序，引自《孙中山选集》页54。

③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页75。

④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57。

⑤ 《明太祖实录》（影印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卷21。

中山上书李鸿章,称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为“中兴”,固然是虚与委蛇之辞,毕竟透露出他受太平天国反清思想影响不很深的消息。朱元璋和洪秀全先后奠都南京,孙中山在南京祭了朱元璋而不祭洪秀全。十分明显,朱元璋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高于洪秀全。

从革命事业的联系来看,孙中山反清完成了洪秀全的未竟之功。但是从民族主义的渊源来看,孙中山取自朱元璋的比取自洪秀全的多。单就民族意识而论,“奉天讨胡”并不比“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进步,洪秀全并不比朱元璋高明。

旧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用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的。

关于当时中国的状况,孙中山写道:“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①“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这个根源乃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②和中国相比,帝国主义国家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新式装备。事实证明,只靠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是不能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清朝虽然已经腐朽,但是它的根基深植在封建主义的土壤之中。事实也证明,只用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是不能推翻“入主中原”而巧妙地利用了封建的忠君思想的满族皇室的。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起义,也被中外反动势力扑灭了。形势迫使孙中山不得不革新他原有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受过多年西式教育的孙中山是胜任这革新工作的。这革新,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是“改良”,用先烈李大钊同志的话来说是“铸新淘旧”。^③这革新,大致说来,共有下述六点。

① 《兴中会宣言》,引自《孙中山选集》页19。

②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页56—57。

③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引自《李达文集》(北新书局1949年版)页229。

第一点革新：孙中山把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思想灌注到原有的华夏民族意识中去，从而改造了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内中国而外四裔”的传统观念。

“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尤其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①使中国也成为这样的民族国家，是孙中山心向往之的目标。孙中山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标举的“自由”，就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毫无疑问，所谓“自由”，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所谓“民有”，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所有。1912年，孙中山异常振奋地写道：“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之事业也”。^②这种思想和“内中国而外四裔”那种传统观念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第二点革新：孙中山主张改君主政体为共和政体，从而扬弃了“尊周攘夷”和“反清复明”这类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和帝制思想的传统观念。

孙中山盛赞法国和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采用共和政体。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前者坚持共和政体而后者坚持君主政体。孙中山还批判了朱元璋和洪秀全，说他们都是搞帝制的。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尊周攘夷”，和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反清复明”，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点革新：孙中山主张“师夷”，从而否定了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引自《列宁全集》卷20（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397。

② 《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引自《孙中山先生外集》（陆达节辑，中华书局1932年版）页65。

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孙中山看到了改“攘夷”为“师夷”的好处,于是他也决意“师夷”了。这“夷”,是国外的“夷”。至于国内的“夷”,孙中山自然是不会想到要奉之为师的。必须指出,这一革新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吸收外国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消极的一面是包含着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第四点革新:孙中山对外尊重和支持弱小民族,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而基本上排除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

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菲律宾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使孙中山受到了教育。从此,他就认为弱小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了。这种实际的教育和学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的心得结合起来,又使孙中山确立了民族平等思想。1904年,他还说过贱视少数民族的话;但从1905年起,他就基本上和“贵华夏而贱夷狄”的偏见决裂了。我们说“基本上”,是因为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他仍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五点革新:孙中山寓联满于排满之中,认为满人并不都是反对革命的,汉人并不都是拥护革命的,虽说要排满,但排的实际对象是反对革命的人,不论满汉,这就破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

这一点革新,本来是上一点革新的继续,然而促使它及早实现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帮了忙。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根本错误,在于竭力拥护他们深爱的“圣君明主”和竭力反对他们深恶的“暴民乱人”。可是他们也爱国,也想救亡图存。他们在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发表的言论并不都是谬说。改良派指责革命派倡导革命排满是搞“种族”仇杀,这倒促使孙中山注意到不要使革命排满走上“种族”仇杀的歧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一个根深柢固的偏

见，革命派中对此深信不疑的人为数甚多。孙中山把它破除，是所有革命党人的表率。

第六点革新：孙中山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族同化，使中国各民族变成一个“中华民族”，从而扫荡了“明夷夏之辨”和“严夷夏之防”这类传统观念。

孙中山关于民族同化问题的理论，是从美国学来的。美国有所谓“熔锅论”，以为一个国家的种族成分和民族成分“总归是纯一比驳杂好”，“解决种族集团和民族集团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不同的种族成分和民族成分的混合、融合以至化合”。^①孙中山主张仿效美国，把国内各民族“合一炉而冶之”，和汉族同化。这个主张可以叫做“熔炉论”，显然就是移植到中国来的美国的“熔锅论”。我们称它为革新，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正确的，而只是说孙中山当年确实认为它是对“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意识的“改良”。其实，这个“熔炉论”无助于改善国内的民族关系，我们将在下文第五节加以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以上六点革新的内容，就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六个要素。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吸收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族纲领，用以改造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而形成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中国内受北洋军阀统治，外受帝国主义宰制，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只算一半成功，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则尚无踪影。严酷的事实告诉孙中山，旧的思想武器不够用了，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① B. Berry & H.L. Tischl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8, p. 12.

利，增强了孙中山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信心。中国五四运动的勃起，鼓舞了孙中山在思想领域内革故鼎新的勇气。孙中山终于发现：在国外，“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①在国内，“国民党正在堕落在死亡”，^②倒是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的。

在把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改造成为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所作的革新，大致说来，共有以下五点。

第一点革新：孙中山正式提出要把反帝国主义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来完成，从而弥补了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一个最大的缺陷。

近代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正确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③孙中山立志革命，虽然是为了使中国免遭被帝国主义瓜分和吞灭的厄运，但是他在旧三民主义时期一直没有把反帝国主义作为一项革命任务看待。在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时候， he 已从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有反帝国主义的必要，然而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纲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纲领。将近半年以后的1923年元旦，中国国民党也提出了“改正”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这时国共合作已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协助孙中山改进中国国民党已有三个多月了。可见，孙中山关于要把反帝国主

① 在邓泽如等十一人联名书信上的批语，引自《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邓泽如著，正中书局1948年版）页312。

② 1924年答宋庆龄问，引自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页87。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引自《毛泽东选集》横排本卷2页594。

义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来完成的主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正式提出来的。后来，这个主张表达得更明白、更正确了。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①同年11月，孙中山昭示国人：“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②

第二点革新：孙中山主张用自决和自治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统一的中国，从而充实了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尚嫌空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内容。

有人说，孙中山的民族自决主张是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学来的。这个意见，假使指的是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过渡时期的情况，那是合乎事实的，因为孙中山在1921年6月说过，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一说，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③可是，上述意见混淆了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过渡时期的民族自决和新三民主义时期的民族自决，前者是对外而言的，后者是对内、对外兼顾而以对内为主的。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关于民族自决的主张，是吸收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族自决主张而提出的。孙中山说过：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没有兑现，巴黎和会以后，“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决，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所受的压迫，比从前更要厉害”。孙中山还说过：列宁“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④孙中山对被 他 称 为“革命中之圣人”的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是十分赞赏的。至于中国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引自《孙中山选集》页525。

② 《北上宣言》，《孙中山选集》页880。

③ 《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引自《中山先生全集》（邓文仪主编，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页833。

④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页629、631。

共产党，则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就提出了“民族自决”。一年半以后，中国国民党也声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①孙中山对内主张民族自决，非常明显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出了民族的自治，和民族的自决合称“民族自决自治”。1924年4月，孙中山也正式主张：“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②

第三点革新：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从而纠正了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师夷”的偏差。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应该说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时就萌发了。此后，孙中山和苏联的联系逐渐增多，对苏联的认识逐渐加深，“以俄为师”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在他的晚年，孙中山多次说过“以俄为师”和“效法俄人”这类出自肺腑的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从“师夷”到“师俄”，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到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可以说是改弦易辙了。

第四点革新：孙中山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从而发展了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认为弱小民族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思想。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是孙中山凝聚着丰富革命经验的遗言。一方面，孙中山自己有真切的体验，在他四十年革命生涯中，只有首先宣布废除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苏联，以及正在从事解放斗争的被压迫民族，对他的革命事业寄予诚挚的同情和希望。另一方面，孙中山从列宁领导的苏联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原则立场得到启示。他曾说：“俄国革命以后，……他们主张抑强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页526。

② 《建国大纲》，引自《孙中山选集》页569。

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是被压迫的或受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①这时的孙中山，已经把民族解放斗争看成世界革命事业，眼界比过去宽阔得多了。

这里有个问题要说明一下，就是晚年的孙中山主张组织“亚洲大同盟”，实行“大亚洲主义”，“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去“抵抗欧洲强盛民族”。^②在他设想的这个“亚洲大同盟”里，日本将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咄咄怪事；但从孙中山当年的思想状况看来，却是顺理而成章的。当年的孙中山已经痛切地领略到帝国主义凶残行径的滋味，可是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残本质。他到底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竟以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可能效法社会主义的苏联，己立立人，己达达人。”^③他还以为“苏维埃主义”就是孔子的“大同”，“日本为尊孔之国，而对此应先表欢迎以为列国倡，方不失为东方文明之国也。”^④出于这种认识，他当然要促请日本和中国一道筹组“亚洲大同盟”了。再往深一层说，孙中山对日本有特殊的好感。一则，他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⑤二则，他认为日本给黄种人争了气。日俄之战，日胜俄败，孙中山从中得到启发，说这证明黄种人不比白种人差。三则，孙中山曾得到日本友人的许多帮助，这些日本友人既有在野的，也有个别在朝的。以上三者，构成了孙中山对日本的特殊好感。因此孙中山觉得“亚洲大同盟”是可以由中日两国在樽俎之间筹组起来的。他哪里想到，这样的

①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页597。

② 《大亚洲主义》，引自《中山先生全集》（邓文仪主编，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页1013。

③ 《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选集》页912。

④ 1923年11月16日《致犬养毅书》，《孙中山选集》页471。

⑤ 《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选集》页898。

“亚洲大同盟”实在是猫鼠同笼。其实，日本先于孙中山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曾经指出，这“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①孙中山倡导的“亚洲大同盟”假使当真组织起来，用不着多久，要么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扩张政策的工具，要么弱小民族另定宗旨排斥日本，要么干脆散伙了事，三者必居其一。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汉奸汪精卫出于和孙中山截然相反的动机，也标榜“大亚洲主义”，以投日本帝国主义之所好。汪精卫居然说，1938年12月22日“近卫声明”所持的原则“正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②这当然是孙中山始料所不及的，但正好暴露了“大亚洲主义”的谬误。

孙中山关于组织“亚洲大同盟”的设想是不可取的，然而他关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教毕竟是真知灼见。

第五点革新：孙中山赞成民族融合，但是不再主张实行民族同化，从而剔除了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疵点。

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说孙中山晚年抛弃了“民族同化或融合”的主张。这种意见，把孙中山主张的同化和融合搅混了，把强制的同化和自然的同化也搅混了。在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强制的民族同化没有了，自然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却还是有的。孙中山在演讲民族主义时，仍然盛赞美国把移民“合一炉而冶之，自成为一种民族”，显然他还是喜欢自然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主张实行强制的民族同化政策诚然是错误的，赞扬自然发生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却是正确的。

以上五点革新的内容，就是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要素。

①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引自《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127。

②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引自周化人《大亚洲主义纲要》（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0年版）页16——17。